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丛书主编 苏长和

# 跨国公司 与全球治理

★——黄河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丛书主编 苏长和

★

# 跨国公司 与全球治理

★

黄河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黄河等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8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ISBN 978-7-208-14954-0

I. ①跨… II. ①黄… III. ①跨国公司-企业管理-研究 IV. ①F2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9014 号

责任编辑 王冲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黄河等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86,000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954-0/D·3157  
定价 65.00 元



## 丛书总序

# 为互联互通的世界探索更好的治理方案

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一套共同价值规范、制度体系、政策网络、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等,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在21世纪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方面互联互通发展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另一方面,阻碍互联互通的观念、制度乃至政策瓶颈依然存在。同时,世界在互联互通中出现许多从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因此,追求更好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成为现在以及今后很长时期各国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也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这套丛书主要探索两大问题,一是事关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非常广阔。就理论而言,较为迫切的问题是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如何处理好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以往的政治学理论要么只是一种国内政治理论,要么只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两者分属两个政治系统,似乎还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贯通在一起的一般理论。现在,随着内外联动的加强,很有必要将两个政治系统打通。因此,在思忖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时候,需要更多地了解类型各异的国家治理体系,因为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必然如空中楼阁,而在建设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时候,也必须兼顾到全球治理体系,因为全球性问题长期不得其解,必然会对国家内部治理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议题还有很多,例如全球治理与主权理论

发展、全球治理共同价值基础、国际制度体系的设计、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等等，都是学界长期进行研究但是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的理论议题。

在实践领域，全球治理的议题非常广泛，大凡各国在国内治理中碰到的棘手问题，同样也会以跨国的方式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只要我们将各国政府下属部门所对应要解决的问题逐一排列开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开始越来越活跃在国际关系领域，例如法律、司法、安全、货币、经贸、税收、交通、卫生、水利、民政、民族、能源、环境、反腐、检疫检验、农林牧渔、文教、网络等等。所不同的是，国内治理体系中有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然而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行政体系一直阙如。这也正是全球公共议题治理的难点所在。上述几乎所有议题的治理一旦进入实践层面，都会提出政府间协调和政府国际合作效能的重要性。一些专业类国际组织在解决这类议题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忽视的。丛书中的一些作品在针对具体国际组织或者特定全球治理实践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会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带来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组织能力的经验思考。

这套丛书还要关注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处于卯榫相合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今日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贡献者，由此带来涉外事务、国际事务管理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可以说，中国既面临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与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是叠加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来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探索出一条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合作共进的模式出来，将会极大地开拓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新的领域，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方案，从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进步。就此而言，在关于当今世界一些重大政治理论的思想竞争问题上，中外学者实际上处于同一思想起跑线上。这套丛书将格外重视和鼓励那些致力于在中外经验比较中打通国内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

丛书既关注中国在具体全球议题治理中作用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方式和经验总结研究;既重视中国同既有全球治理制度体系关系研究,更会突出中国在制度体系建设中的创造性作用研究。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一些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应该未雨绸缪。例如随着国家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互动的加强,各国政府的管理职能会延伸并交叉在国际领域中,中国也不例外。那些具备高效国际行动能力的政府,自然是未来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也是中国着力构建适应全球性大国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所在。就此而言,像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国际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政府在国际上行动能力提升、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地区治理、互联互通产品提供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如何把世界组织起来,让世界变得更有秩序,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科长期思索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世界的互联互通更加提出回答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的初心所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国家重点学科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布局全球治理研究,目前形成了由若干个中心组成的中国与全球治理综合研究网络。这套丛书展现的并非只是复旦学者的成果,丛书是开放的,是不同学科围绕全球治理问题展开交流的一个思想平台,我们希望在中外学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共同办好这套丛书。

是为序。

苏长和

2017年4月22日

于复旦大学文科楼

# 目 录

丛书总序 为互联互通的世界探索更好的治理方案	1
导论	1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起源及其战后发展特征	1
第二节 “全球治理”概念兴起的背景及其内涵	5
第三节 全球治理的主要模式	12
第四节 跨国公司的结构性权力及其影响	22
第一章 全球化视野下的跨国公司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	30
第一节 跨国公司与全球资本版图的重构	31
第二节 跨国公司与全球化转型	39
第三节 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的体系及议题	54
第二章 跨国公司与公共外交	66
第一节 跨国公司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	66
第二节 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的内在逻辑、行为模式与实施 路径	75
第三章 跨国公司与全球气候治理	89
第一节 跨国公司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行为体	89
第二节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95
第四章 跨国公司与国际发展合作	124
第一节 国际发展合作的定义、起源、困境与趋势	124
第二节 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动力与模式分析	136

第三节	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与援助的“安哥拉模式”探讨·····	149
<b>第五章</b>	<b>跨国公司与区域性公共产品·····</b>	<b>163</b>
第一节	跨国公司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博弈供给·····	163
第二节	跨国公司参与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	171
<b>第六章</b>	<b>跨国公司垄断及其与东道国的政策博弈·····</b>	<b>185</b>
第一节	跨国公司垄断的本质特征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186
第二节	跨国公司与中国外资政策:基于政策博弈的视角···	199
<b>第七章</b>	<b>跨国公司与转移定价·····</b>	<b>249</b>
第一节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分析·····	250
第二节	跨国公司在华实施转移定价的影响及法律体系·····	262
<b>参考文献</b> ·····		<b>286</b>
<b>后记</b> ·····		<b>302</b>

# 导 论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将政治等同于国家或政府的活动。严谨的政治家则认为,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政府还没有出现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政治实践活动。<sup>1</sup>即使在国家和政府出现之后,也不是所有的政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国家和政府。公司对政治与社会活动的参与就是一个例子。

##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起源及其战后发展特征

在传统上,理论界倾向于把公司定义为边界清晰的层级(hierarchy)组织,经济交易要么通过市场进行,要么通过企业组织实现。企业理论认为,生产和交换是通过制度(契约范式和组织形式)进行的,这些制度反映了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的特性。<sup>2</sup>企业组织可被视为主要作为对资本市场中失效的反应,是由内部组织对市场组织的一种替代。<sup>3</sup>

公司是以赢利为目的、依照一定的结构与程序而组建的、能够独立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企业组织。从现有资料上看,近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公司大致出现于17世纪,而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当时埃及王亚迈西斯(Amasis,公元前569—前529年)统治下的瑙克拉梯斯(Naukratis)成立了四家商业公司,各有特殊的经理人员,并与其“母市”保持着联系。在古罗马,由骑士阶层出身的包揽商人投资成立了第一个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的类似于公司的组织,有从事包征税金的,也有对军队承办粮食或武器的。<sup>4</sup>

作为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在经济生活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产出的 36%,远远超过德国的 16%和英国的 14%。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会发现,历史上某些国家或社会的重大事件和转折,居然和当时人们是否实行“公司”组织这件事有关。大型公司的崛起,使美国得以通过资本市场和管理能力的发展,大大增强其生产能力。与此同时,对德、日等后起国家而言,其经济的兴起与强大,也和实行公司组织的轨迹相呼应。人们不禁感叹,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组织,不是公社、政党、教堂或庄园,而是公司,唯一能够和公司相提并论的恐怕是家庭。因此,公司是一种政治产物,公司所获的特权是由国家或政府机关所赋予,建立在某种特许地位上。各国所发展的公司组织与结构会随着自身政治理念和体制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内涵。<sup>5</sup>

公司组织独立于个别资本,使企业规模的扩大能够不受个人手里所积累的财富大小的限制。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就是铁路,它为股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股份公司打破了私人财产的局限,因此似乎只受社会资本量而不受单个资本量影响的意义,在它出现的初期就表现得很明显。<sup>6</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称 FDI)为特征的现代大型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NCs)开始产生并蓬勃发展。它们具有全球性经营动机和一体化经营战略,在多个国家拥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并将这些机构置于统一的全球性经营计划之下。<sup>7</sup>

戈歇尔(S.Ghoshal)和巴特利特(C. A. Bartlett)把跨国公司定义为由外部组织网络所包容的内部差别化网络组织。<sup>8</sup>在不同国家的企业及其员工之间,结成全球性战略联盟或网络,这本身就使跨国公司拥有一种长远的竞争优势。成功的跨国经营活动必然是根据东道国政府的需求形成的经济责任和目的与政治责任和目的之间动态平衡的结果。<sup>9</sup>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参照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83年)的标准,跨国公司是指由母公司及其国外(境外)分支机构组成的法人或非法人企业,也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拥有并管理经济单位的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由一个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数个国家的制造业、农业和采矿业或服务业内取得经济单位的所有权和管理

权,在其海外的子公司或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机构中,母公司的股份一般不少于10%。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形态,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经济资源全球最佳配置的重要载体。一大批拥有巨额资金、掌握先进技术和技能的公司打破国界,实施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既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结果,又成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重要推动力。<sup>10</sup>

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考察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霸权史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同霸权的兴衰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他指出,经济学家所看重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国际分工、产业升级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只提供了推动跨国公司发展的充分条件;而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为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结构性权力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sup>11</sup> 吉尔平认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领导西方世界的重任。美国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全面的安全保障,也为世界经济确立了基本的体系和规则。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首先,在全球层面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令人愉快”的政治经济环境。其次,在跨国层面上,美国在欧洲和日本驻军并同它们保持同盟关系,为美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提供了稳定和安全的政治环境;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政治影响力也为美国公司进入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能源地区创造了条件。再次,在文化层面上,美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市场资本主义等价值观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消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最后,在美国国内,政府推行的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等政策也鼓励了大公司的海外扩张。

上述趋势使冷战结束后跨国公司的发展呈现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企业界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的转型。简言之,跨国公司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建立分支机构,由母公司统筹决策和控制,从事跨国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全球公司则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它们拥有全球战略、

建立全球管治结构和承担全球责任。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其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比例的平均数)超过 50%。由于主要收入和主要资产均来自海外,全球公司经营的重心在海外,其发展战略、管治结构和理念文化更注重全球层面,形成了全球经营的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sup>12</sup>

第二,跨国公司战略技术联盟地位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国家基金会出版的《科学与工程学指标 2010》(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0)显示,1980—2006 年,全球共建立了 13 308 个技术联盟,年均增长率为 7.4%。特别是自 21 世纪以来,企业间的技术联盟保持着年均近 10% 的增长率。在 2006 年建立的 898 个企业间的技术联盟中,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联盟分别为 526 个和 206 个,占总数的 81.5%。<sup>13</sup>

第三,在世界 500 强公司中,美国的公司稳居首位。在 2015 年度《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中,美国公司占据 128 席,其中按年度运营收入计算,作为超市连锁巨头的美国沃尔玛公司以 4 856.51 亿美元的年营业额蝉联榜首,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和雪佛龙公司分别占据第 2 位和第 3 位。与此同时,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统治地位仍无可撼动。当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呈现上升势头。以中国为例,2015 年中国共有 106 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 500 强。

第四,跨国公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当今许多跨国公司的资产和年销售额已经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 200 个在国外有最多活动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附加值名列榜首(630 亿美元),它在国家和跨国公司经济实力排行榜中排第 45 名,稍低于智利(710 亿美元)。跨国公司中名列第二的是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它的附加值为 560 亿美元,经济实力排第 47 名,高于秘鲁、阿尔及利亚、新西兰和捷克。另一些跨国汽车公司如福特公司(Ford)、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Daimler Chrysler)以及英国石油公司(BP)等,其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越南、科威特和古巴等发展中国家。

第五,国际影响扩大。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国籍、工种和疆界对

跨国公司来说不再是组织全球生产的障碍,反而成为其权衡各国各地的相对优势、决定去何国何处投资和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重要依据。尽管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间谁占据主导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息,但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话语权不断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母国政府往往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跨国公司扩大对外投资,如减免税收负担、提供研发支持和出面与他国政府进行政策协调等;另一方面,投资对象国即东道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得不对跨国公司网开一面,在税收、环保和劳工待遇等领域给予其各种超国民待遇。<sup>14</sup>

第六,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逐渐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多半是强调纵向分工和命令控制,总部权力集中,统一规划管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跨国公司调整了组织结构形式,大幅减少了管理层次,使其组织结构形式从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不断向网络化发展。跨国公司采取全球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根据不同的区位优势,将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分布于全球各地,把所有分支机构连接成一体化经营网络,使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活动能够服务于企业的全球发展战略,从而降低企业集团的整体经营成本,提高了企业集团的竞争能力。<sup>15</sup>

## 第二节 “全球治理”概念兴起的背景及其内涵

在跨国公司和跨国技术的冲击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管理复杂社会的任务不再只由政府负责,还涉及类别广泛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织。如今,政府正逐渐被“治理”的理念所代替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sup>16</sup>1989年,世界银行引进政治发展中的“治理”的概念,并在其后得到学者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以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等人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明确地把“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less 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作为其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其名著《没有政府的治理》中,将治理定义为“是由

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sup>17</sup>他把治理与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政府统治区分开来,明确指出治理不仅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政府和非正式的机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比善于治理的政府更为可取。罗西瑙认为,管理或统治和治理的概念是有区别的。虽然两者都指有目的的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或者规则系统,但管理或统治提议的活动以正式的权威为后盾,靠警察强制力量以确保正式政策的实施;而治理的一系列活动是以共同的目标为后盾,这个目标可能来自法律和正式规定的职责,它不一定需要警察强制力量去消除对抗和实现遵从。换言之,治理比管理或统治更具包容性,更能满足政府的需要,并通过组织及其职员来实现管理机制。<sup>18</sup>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尤其是企业化的政府改造及政府再造理论等理论的推动,强调政府应当向企业学习,建设企业型效率政府,进而在公共管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强调企业、非政府组织(NGO)或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合作功能。<sup>19</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带来的种种不可治理性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全球化使世界连成一体,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水准的财富。另一方面,全球化削弱了国家边界和国家政府的重要性,产生了一些赢家和许多输家,扩大了世界的不平等性。全球化在使各国融为体的同时又使各国相互分离;在增强某些国家力量的同时也侵蚀着另外许多国家的主权,<sup>20</sup>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全球化的空间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相分离。”<sup>21</sup>资本借全球化之机而向民族国家渗透,跨国企业在与民族国家讨价还价后获得了极其优惠的权利,或者得到民族国家政府的默许而成为许多国家的“国中之国”,侵蚀着那些地区的利益,破坏了那些地区的资源,在把剩余取走时为那些地区留下了环境污染、疾病和贫困。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原来的国内问题成为国际问题,除了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战争与和平等传统问题之外,还涉及环境和生态保护、核武器扩散、国际移民和难民、全球性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疾病控制、种族和宗教冲突等对人类

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共同事务。这些问题的发展不仅以跨越国界为趋势,而且走向了全球,使全球秩序和治理的前景成为一个超越其他的议题。这些都给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sup>22</sup>

例如,新保守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主张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安全优先和美国第一,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重新调整和确立国家安全的“新坐标”,提出了“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该词最初出现于2007年8月28日《普罗维登斯杂志》(*The Providence Journal*)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是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家詹姆斯·柯齐克(James Kirchick)。他认为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意味着“奥巴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减少人道主义干涉的规模。2009年12月10日,奥巴马在被问及究竟什么是“奥巴马主义”时回答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无论是毒品、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都不能仅靠一个国家来解决。”<sup>23</sup>

由此可见,世界上大量的跨越国界的问题引发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问题。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既包括有权威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sup>24</sup>。随着公司间联系日益密切、资金日益充足,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不断涌现,跨国公司在很多贫困社区与地方逐渐发挥了“影子政权”(shadow state)的功能,即为公众提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影子政权”角色受到政府的肯定与鼓励,因为它正好可以填补政府在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中的缺位。<sup>25</sup>同时,由于全球化使国际和国内事务的坚固边界变得模糊,并出现了权力逐渐分割和社会变得不断分散化或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趋势,暴露出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传统国际体系在快速变化以及日益复杂化的全球化时代中的不适应。<sup>26</sup>因此,在以传统国际体系为特征的全球体系中,需要某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社会需要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制度和组织上各方面的框架安排。<sup>27</sup>

全球治理理论包含了一系列主张:(1)去中心化,国家的主权地位

和中央政府在公共行政中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向地方分权、向社会分权,甚至将权力让渡给跨国家的组织成为一种趋势;(2)多中心,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须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共治、社会的自治成为一种常态;(3)反对夸大纯粹市场的作用,但认同并倡导等级、网络 and 市场的组合及相互渗透;(4)多种层次的治理与多种工具使用的并存,治理可以在跨国家、国家、地方等多个水平上进行,在实践上则可以“通过规制、市场签订合同、回应利益的联合、发展忠诚和信任的纽带等”不同的工具,并借助市场、层级和网络的结构使用这些工具。<sup>28</sup>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在《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治理应该遵循十项原则:(1)调控应该面向未来,最大限度避免商业实体作出的决策出现冲突;(2)尊重国家合理限度的主权;(3)多元化统一是各个国家的权利;保留自己的一些机构,也要考虑国际兼容性,并遵守国际核心规则;(4)关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要给予有限的自主权,同时尊重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顺从全球通用标准,通过商定实施区域和全球监管;(5)将之前决议中属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权力移交给区域集团;(6)给行政当局领导人更大的特权,允许其在国际讨论会作出适当的决策;(7)强制贯彻正式采纳的规定;(8)采用新的体制秩序,推出全球性方案解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问题;(9)需要作决定时,进行国际公开咨询;(10)邀请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一些国际机构的会议。<sup>29</sup>

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治理是比政府更为宽泛的概念。尽管它仍无固定和公认的定义,但它在最广义上是指协调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因此,政府可视为参与治理的机构之一。主要的治理渠道有市场、阶层和网络。该术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国家/社会界分的模糊性,这是新公共管理形式、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政策网络以及超国家和次级国家组织等发展变化的结果。<sup>30</sup>

其实从历史上看,民营化的出现就是对国家扩展的逆转,尽管这种逆转的有效性和程度仍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国家的垄断只是一个近来的现象。比如出于经济节约和时效性的考虑,统治者常常使用雇佣军而非仅仅招募臣民进行战争。在前拿破仑时期,现

代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形成阶段尚未到来,主权当局在最基本职能上采取“民营化”的现象绝非偶然。或者更确切的说法是,被许多现代人视为当然的国家垄断职能,其实不过是近代以来这些职能被国家化的后果。纵览历史的长河,很多职能的国家性(stateness)都是近代以来才完全形成的观念,而非国家组织拥有和行使这些职能的情况却是长期存在的。从历史上看,许多武装力量不是由国家组建的。大多数部族军队与国家无关。例如,大多数封建军队、骑士团、商人民团(类似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大多数造反武装和游击武装实际上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今天的大多数恐怖分子以及抢劫团伙、青年犯罪团伙莫不如此。今天,这种军事组织其实依然遍及世界各地。<sup>31</sup>

例如,私人军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y/contractors/firms)源于西方雇佣兵传统,在当代以合法经营的公司为其组织形式。这一概念与通常所说的私人保安公司(private security company)既可以被认为是相同的,也可以认为私人保安公司属于私人军事公司的一个类别。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将这类公司统称为PM/SCs。根据私人军事公司研究领域最知名学者皮特·W.辛格(Peter W. Singer)的研究,可将私人军事公司分为三类:军事供应公司(military provider firms),提供战略支持与建议,包括直接的军事支援;军事咨询公司(military consulting firms),主要由退役军官组成,负责提供训练等服务;军事支援公司(military support firms),负责技术、情报、后勤等服务。<sup>32</sup>目前,英美两国的私人军事公司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战乱国家)大规模地扩张、发展,为两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个人等提供了各项服务。包括了战场生存技能培训、要员护送、应急急救、绑架谈判、人质解救、地雷清除、园区保卫等大量的安全保障服务,为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提供了保障。例如,安德鲁凯因集团(AKE Group)主要业务是向记者、援助工人和其他平民提供战场生存方面的技能培训与紧急医疗救助,其在2005年营业额达到了600万英镑;装甲组织(集团)国际(Armor Group International)2006年签署了保护英国在阿富汗使领馆的合同,价值3000万美元;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通过世界各地雇佣的情报人员收集信息并为企业在海外的的发展提供建议,同时其危机应对小组曾在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的过程中,疏